

# 中外军事历史博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部编

○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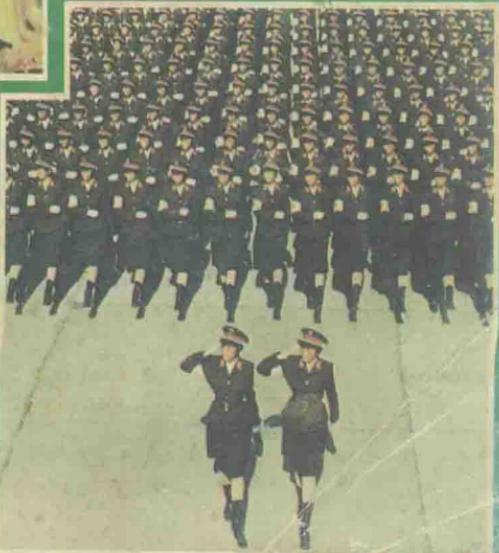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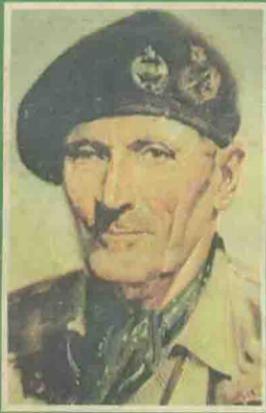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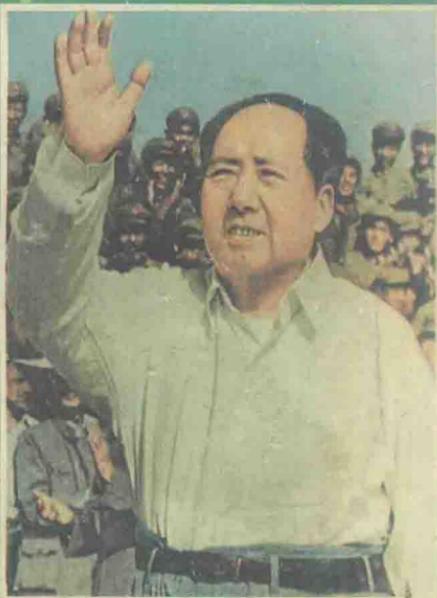
○淮海战役中蒋军高层决策内幕

○当今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作战特点

○麦克阿瑟策划仁川登陆

○特异功能在军事上的应用



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原稿：周生

# 中外军事历史博览

高锐 远 踏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部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主编：胡命烈

编辑：赵功德

## 中外军事历史博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部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21开本 7印张 200千字

1992年 第2版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 20000册

ISBN 7-80021-288-2/E·226

定价：3.00元

## 编 辑 说 明

《军事历史》杂志以它肩负的使命走向社会以来，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作者的关注和热情支持。许多专家、学者惠赐了他们的力作。这些论述严谨、史料翔实、风格迥异的华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一些热心的读者来信，建议我们筛选一些作品，汇编出版，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

为此，我们从近几年来发表于《军事历史》的几百篇文章中选编了《中外军事历史博览》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本书除汇集一部分学术论文外，适当增选了一些知识性、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力求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军事科学出版社王显臣副社长给予了具体指导。同时，该书的选编工作得到了《外国军事学术》、《国防》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胡命烈主编，赵功德参加选编。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部

(四)

目 录

(一)

将帅协调	毕建忠(1)
——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	毕建忠(1)
周总理运筹的一次援越军事行动	马发祥(9)
中国军队在老挝抗美战场上	艾凌耀(14)
金门之战实况	彭允太(20)
淮海战役中蒋军高层决策内幕	郭汝瑰(24)
建国后的四场自卫还击战	宋任远(36)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至第五次战役	李荣耀(40)

(二)

越军侵柬战役作战特点	赵晓兵 秦翔友(47)
阿根廷军队为何败在英军手下	王增铨(50)
八天结束的战争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之战	王增铨(56)
两伊战争	李云龙(61)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作战特点	魏军(67)
麦克阿瑟策划仁川登陆	赵焕明(69)
古巴导弹危机回顾	林野(7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密码战	严瑞池(74)

(三)

中央军事委员会沿革	支绍曾(7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沿革	徐凯(84)
当今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	南丁(87)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军	蔡维汉(94)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7军	张克勤 张润森(96)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	李荣耀(98)
东北抗联教导旅纪事	赵国勤(100)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简介	黎连荣(105)

#### (四)

世界主要国家的快速反应部队	钟舞春(107)
美国对2000年战争的预测	王保存(110)
西方的心理战部队	石毅(113)
特异功能在军事上的应用	聂送来 王保存(115)
美军情报活动秘闻	杨岐鸣 编译(118)
美国武装部队中的女军人	刘小英(120)
西点军校轶事	林森建 忠(122)
美军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	张海山(126)
访美见闻	孙柏林(127)
柏林墙修建内幕	杨宁编译(130)

#### (五)

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	(133)
获我军将军衔的一位外国人	(133)
我国最早的一幅军事地图	(133)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134)
名将艾森豪威尔	(134)
血胆将军巴顿	(135)
沙漠之狐的征服者蒙哥马利	(136)
带死刑立大功的苏军名将	(137)
传递谍报的邮票	(137)
好奇招来杀身祸	(138)
化装侦察狡入侵	(138)
激怒牛群巧炸桥	(138)
日军密码四次落入美军之手	(139)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建议的提出	(139)
非洲历史上的一支娘子军	(140)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140)
封底注释	(142)

# 将 帅 协 谋

——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

毕建忠



在全国全军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的今天，迎来了震惊中外的伟大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 40 周年。重温驾驭这一伟大历史飞跃的将帅——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指挥艺术和功勋，令人难以忘怀，催人奋进！

从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我军在 4 个半月的时间内，经过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部队等 154 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基础。

关于这次战略决战胜利的伟大意义，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就预言：“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①1949 年 4 月 17 日，周恩来指出：经过战略决战，“蒋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79 页。

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个战争是失败了，他的反革命企图是失败了。”①1951年7月，朱德说：“经过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国人民革命的全国性的胜利局面，就已经确定了。”②可以说，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新中国的奠基石。

关于这次战略决战胜利产生的国际影响，当时在世界上也多有评议。1948年11月2日，英国《电通社》记者从伦敦发出的评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乃是美帝国主义开始争取战后世界霸权及反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以来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所受最大的一个军事打击。破产的蒋介石政权已无力阻挡进攻中的人民解放军。很显然，亚洲力量的对比正在确定地变化。”③

1948年11月9日，据国民党《中央社》纽约英文电讯，美国陆军次长德莱柏在向美国全国贸易大会发表的讲演中称：中国及其数亿人民处于内战的胜利之中，美国在远东的直接责任集中在日本和朝鲜。对此，有些观察家推论认为，至少是美国陆军部现在业已实质上从其战略计划上将中国勾消而集中力量建立日本、〔南〕朝鲜为远东反共堡垒④。1949年1月26日，菲律宾《纪事晚报》在其社论《中国革命》中评论道：“近代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中国革命已将近胜利结束了。”“共产党可能刺醒中国的睡狮”，这将大大影响整个亚洲

及世界的未来⑤。

伟大的战略决战及其辉煌的胜利，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发展了作为这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决战思想。它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三大战役的胜利既是中国革命战争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组织与指挥这一伟大决战的指导者所展现的杰出统帅艺术的助产物。身任中共中央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就是组织与指导这一伟大战略决战的主要决策者。他既是善于独立驾驭全局的最高统帅，又是善于发挥群体智慧的能手。他组织与指挥这次战略决战的方法，主要有以下的特点：

一、发挥中央领导“一班人”的集体智慧，对战略决战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适时形成正确的战略决战构想

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两年作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64万人，解放和收复了广大地区和许多重要城镇。我军节节胜利，蒋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5页。

② 《新华日报》，1951年7月号。

③ 《东北日报》，1948年11月7日。

④ 新华社《参考消息》，1948年11月13日。

⑤ 同上，1949年1月29日。

军着着失败。中国革命战争出现了夺取有决定意义胜利的敌我主力进行决战的局面。如何组织这一新的胜利呢？毛泽东于1948年9月上半月主持召开了党的政治局会议，经过11天的会议准备和3天的正式会议，检查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工作，并讨论与决定了党的战略方针与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全面的发言，其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打倒国民党。作战方式要逐渐走向正规战争，军队要统一编制。对此，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关于战略形势问题。刘少奇说：根据过去两年经验，预计5年之内歼敌500个旅，打倒国民党，这是稳健的估计。前两年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而现在双方优劣总算起来，已经大体相平，并且将是过渡到我军超过敌人。如果济南、太原打胜攻下，东北获得大胜，那么，9、10、11月就过关了。

关于决战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指出，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现在我们是在准备大会战，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个关过了，那就解决了胜利。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军主力来援，那是于我最有利的。将来在徐州决战是最大可能的。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在一个地区说，是最后的决战，而对全国说则又不是。

关于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周恩来说：（1）战略任务，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在5年内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2）作战方式是攻坚与野战相结合。今后仍应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这是为实现毛主席之战略方针必须准备的。（3）各战场之战役上的协同将增加。（4）战争的计划性加强了，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要求部队教育、政治工作及各种制度规章之建立。（5）后勤之统一计划与协同配合的建立。（6）军事组织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指出，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

关于军队建设。周恩来说：第三年建军方针是充实野战部队，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精简后方机关，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实行全军统一编制。

毛泽东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党内指示，以及许多重要的作战方针的指示。向全军明确提出了要确立敢于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的决心；制定了“攻济打援”和“攻锦打援”的方针与部署，要求对增援济南的徐州之敌3个兵团和增援锦州的卫立煌全军，敢于就地歼灭。

这次政治局会议，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战略决战的会议，但对明确决战思想，对战略决战的展

开，却是一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会议。

## 二、统帅与主要助手之间密切磋商，实行分工协作

在中央军委的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亲临各战线指挥作战的情况下，对于重大战略问题与作战中其他重要问题，主要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兼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代理总参谋长）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等磋商解决。同时，为适应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协调各战略区的行动，随时处理瞬息万变的战况，并为保证其他方面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央分工毛泽东集中精力来处置战略指导上的问题，并由周恩来协助。

毛泽东作为组织与指导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统帅，他既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更把注意力的重心始终放在对决战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在决战期间，他看过各野战军发给军委的电报近千份，他亲自起草的电报指示 300 余份。其中有《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重要决策文件。决战过程中，毛泽东根据敌人的企图、部署，在运筹我军制胜的对策时，常亲自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与之作亲切交谈，反复磋商。对于一些重要情况的处

置，如对林彪关于不打锦州、回师打长春的建议，毛泽东起草好复电后，亲自批示先送朱、刘、周、任等征求意见，待他们阅后再发。毛泽东这种民主作风，对于加强集体领导，建立军委在全军中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或减少重大失误，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非常注重发挥身为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的军事才智。而周恩来则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承担起辅佐毛泽东进行军事组织工作与运筹战略决策的重任。为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作准备，周恩来主持制定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并就战略计划、作战、建军等问题，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会后，又根据中央决定，制定了《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活动中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组织才能。

对各方来电，除最紧急的直接送毛泽东阅处外，一般是周恩来加以汇集，有的提出处理意见，上报毛泽东。有时受毛泽东的委托或在毛泽东休息时，为军委起草电报指示，待毛泽东阅示后再发出。据不完全统计，由周恩来起草的有关三大战役的作战指示、批示和贺电等文稿近 40 份。如发起平津战役，就东北野战军究竟何时入关为宜的问题，周恩来于 11 月 17 日从战略全局着眼，就作了这样精辟的分析：在黄百韬兵团即将全歼的情况下

下，蒋介石有可能将傅作义集团这个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全部南撤，直接使用于防守江南，或先使用于协同黄维、李延年向北接出邱、李、孙三兵团，然后集中约 90 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另一种可能是美蒋为争取时间，在南方重建军力，不惜牺牲平津张唐等处兵力，只求迟滞东北野战军进关三四个月。但是我们的计划应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基于上述分析，周恩来指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 24 个师及傅系步骑 16 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并提出：东北野战军是提前于本月 25 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在抑留平津之敌的情况下，继续休整，然后大举歼敌；还是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 12 月中旬，然后沿平汉路南下？要林、罗郑重考虑后电复。此电稿虽经毛泽东作了补充、修改，但周恩来明确提出了抑留蒋傅军于平张津保地区而彻底歼灭之的平津作战方针，对就地歼灭国民党军战略集团的决战思想是一重大贡献。

实践告诉我们，我军战略决战的指挥权，实际上是集中在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辅的统帅与代总参谋长手里。这样，无疑对三大战役的胜利进程是大有益处的。

### 三、既全局在胸，运筹决

策，又善于倾听前线指挥员的卓见

预先计划和准备战争或战役，确定在战争或战役中达到军事政治目的的适当步骤，是战略指导者的重要任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毛泽东对战略指导的一句名言。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即进行三大战役前，国民党军的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安五大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困，陷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但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集中主力、依托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或战略要点进行重点防御（在形势不利时又随时准备撤退），同时组织若干机动兵团互相救援的战略方针，使人民解放军欲继续发展新的攻势，必须以决战的姿态组织新的战略性战役，必须制定初战必胜，并有利于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计划。因此，对于我军的战略指导者来说，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投下一着妙棋；只有预作运筹，才能有组织、有准备地夺取战略决战的胜利。

当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正在胜利发展，长春、沈阳、锦州地区之敌即将被完全分割和孤立时，毛泽东作为全军统帅着眼于东北战局的发展趋势，于 1948 年 2 月 7 日即电示林彪、罗荣桓：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是极具战略远见的决策。7 月 20 日林罗向军委报

告，东北局常委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的决定后，毛泽东即指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第 13 军。并于 9 月 7 日明确指示林罗：（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这种敢于同敌军重兵集团进行决战的决心，对东北野战军与全军来说，当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8 年 9 月 24 日，粟裕提出以攻占两淮和海州、连云港为目标的淮海战役建议之后，毛泽东从中原战场敌我兵力对比将相差无几的基本情况和敌人可能的部署出发，先后指出了争取淮海战役胜利的四个关键问题：第一，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必须采取攻济打援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时，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灭援敌一部；第三，中原野战军在攻占郑州后，直出徐蚌线歼灭孙元良兵团，攻占宿县、蚌埠，陷刘峙集团全军于孤立地位；第四，第一仗歼灭黄百韬等部 21 至 22 个师，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部署和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为了牵制并歼灭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即于 1948 年 10 月 31 日决定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休整一个月左右，然后全军入关，协同华北我军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随后，为了防止蒋傅两系从海上南撤或从平张西逃，毛泽东又于 11 月 16 日要林罗考虑是否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18 日指示华北各兵团，停攻归绥和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早日逃跑。从而，为实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战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虽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各战役制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但是由于情况的变化，有些预定部署必须依战场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才能保证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各前线指挥员都及时向军委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自己的建议。对此，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虚心地考虑和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卓见，及时修改了某些作战方案。例如，我军攻克锦州后，当蒋介石令廖耀湘兵团以“规复锦州”<sup>①</sup>的方法，实行向关内的总撤退时，林彪、罗荣桓等建议：就势

<sup>①</sup> 台湾《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82 页。

从新立屯地区向黑山、大虎山实行诱敌深入，以待攻锦部队回师辽西，聚歼廖耀湘兵团。毛泽东当即批准这一建议，改变了预定的以攻击锦西和山海关调敌西进而歼灭之的计划，并指出要防敌向营口逃窜，从而，迅速达成了全歼廖耀湘兵团的目的。在淮海战役中，当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在“刀锋似已略形钝挫”的情况下，毛泽东批准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集中兵力先歼灭黄维兵团的建议，为取得淮海战役的关键性胜利掌握了主动。在平津战役中，当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已被歼灭之后，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鉴于塘沽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全歼该地敌人的情况，建议推迟攻击时间，以进行充分准备，细密组织。林、罗也向军委报告平津之敌突围征象很多。对此，毛泽东当即复电林、罗、刘（亚楼）：既然平津敌突围征象很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指出：对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应考虑将平张线上的杨（成武）李（天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两兵团东调，参加平津作战。从而有利地保障了将平津之敌就地歼灭之决心的顺利实现。

决战胜利证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预见和决策，是前线指挥员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而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又是军委

和毛泽东修改预定计划、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的重要补充。对于前线指挥员的建议，毛泽东并不是一般的“照准”，而是从全局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有时是与周、刘、朱、任等商量之后，作出更符合实际、更全面的定夺的。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权威能达到全军充分信服的地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 四、既大权独揽，又让前线指挥员在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毛泽东倡导的一项重要的领导原则，也是重要的军事指挥原则。凡关系到战争全局胜负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历来主张军事决定权要高度集中，即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sup>①</sup>。但他又同时主张，在总的战略（战役）意图下，乃至情况紧急时，前线指挥员有临机处置、机断行事之权。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指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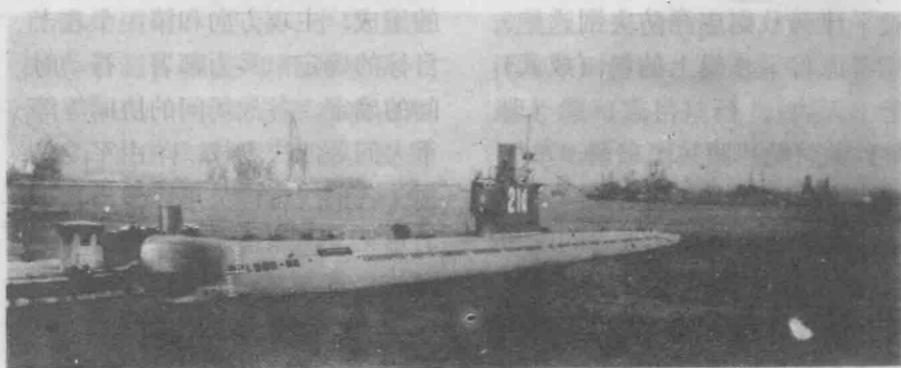
在这次战略决战中，凡属战役的统一指挥机构的组成、部队的编成，主攻方向和第一个攻击目标的确定、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的确定，各战场间的协同等等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均由军委总揽。各前线指挥员可以提出行动的意见，但须待军委批准后才能实施。在平津战役发起前十天，即1948年11月19日22时，林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7页。

罗刘向军委提出要程子华、黄志勇兵团于 24 日全力包围唐山，使敌不能南退。毛泽东于 20 日 24 时复电林罗刘指出：对唐山敌人的包围，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才能行动。这是因为，在东北主力尚须两三个星期才能到达平津前线的情况下，过早包围唐山，如蒋傅决策以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唐线，不仅可以接出唐山之敌，且可完成从海上撤退的准备，使我军很难歼灭该敌，故应推迟包围时间。在傅作义集中 5 个师、3 个骑兵旅于张家口、4 个师（据当时了解）集中于宣化时，为了防止宣化之敌向张家口集中，造成既难歼灭，又易合力西逃的形势，毛泽东指示华北第 3 兵团必须集中必要兵力于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待第 2 兵团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独立地看，这些事并不大。但它却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之处，所以，毛泽东都将此作为大事，而

独揽其决定权。在战役计划几经磋商已经决定、情况并非重要或情况紧急时，毛泽东又总是注意授予前线指挥员机断行事的权力。当华东野战军首长于 1948 年 11 月 6 日向军委报告整个战役按预定方针于 8 日晚展开攻击时，毛泽东第二天即复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当刘陈邓依据当面敌情，建议军委批准先打黄维时，毛泽东亦复电：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像这样的范例并非鲜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我军建立了良好的指挥关系。它既体现了毛泽东卓越的统帅才能，也充分体现了广大指挥员的聪明才智。两者的结合与统一，便形成了我军在战略、战役指导上的无敌威力。



停泊在基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潜艇部队

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

对宝岛员县海防部队

# 周总理运筹的一次援越军事行动

马发祥

在北京风和日丽的一天，我拜访了一位已离休的老首长。进入庭院，满头雪霜的主人已等候在会客室门前。他就是1972年任海军副参谋长期间，曾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布置并指挥中国海军援助越南扫雷战斗的红军老战士来光祖将军。

会客室玻璃柜里的玳瑁（标本）、海螺和珊瑚，系着将军与大海的情思。毛泽东半身塑像置放在电视机柜上，周恩来的画像陪伴在一侧。

我们的话题是从周恩来说起的。

“听说1972年越南向中国政府提出派海军帮助扫雷的要求后，周总理紧急召见了您？”

“是呀，是呀！”来将军理理自己的白发，眯起眼睛想了片刻便侃侃而谈起来：

那是1972年5月9日，都晚上9点多了，值班人员突然报告：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请海军司令部马上去一位熟悉情况的首长见总理。我向肖劲光司令员、潘焱参谋长报告后，就带着作战部长和装备技术部副部长，立即驱车前往。

汽车直接进入中南海，停到周总理办公室门口。一进总理办公室，只见里边已坐满了人，其中有外交部和交通部的领导等。过去，我曾多次见过总理，但被总理召见却是第一次。另外，也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当时心情还有些紧张。

总理见我们来了，说：“好呀，就等你们了！”

我们刚坐下，总理就问我什么职务，叫什么名字。我说是副参谋长，叫来光祖。

“来——哪个来？周恩来的来？”总理问。我说是的，来的是。“哎哟，这个姓可不多见啊！”总理双目炯炯地环视了一下大家，接着说：“不过，你的名字蛮封建的呀，光宗耀祖啊！”

我连忙说，“不，总理，我这名字是光荣祖国的意思。”总理一听，哈哈大笑，“好，你这个解释真好！”说得满屋的人都笑了。

总理又问：“你们参谋长是谁？”我说：“潘焱。潘是三点水的潘，焱是三个火的焱。”“好家伙，”总理风趣地说；“三把火？两把火不够，还三把火！”接着又是一阵笑声。

过了一会儿，屋里静了下来，总理的表情也严肃起来，说：“今天把各位请来，开个紧急会议，主要研究一下帮助越南扫雷的问题……”

听总理一介绍，我才知道，原来是外交部当天向总理报告，越南驻华大使紧急求见总理。总理明白：大使是为美国布雷而来的。

当天凌晨，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越南北方沿海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实施大规模布雷，进行全面海上封锁。

尼克松讲话一小时后，美国就出动海军舰载机 100 余架，各型舰只 6 艘，在对越南海防、广安、鸿基、深山等沿海地区进行轰炸和炮击之后，即以舰载飞机 40 余架布雷，并逐步扩大范围，然后封锁了海防、勒苗等重要航道及太平河、马江、格会口、各梭口、筝河、红河口、文奥河、茶李河、勒县河、格禁河等。接着，又多次补充布雷。

当时，越南北方接受外援物资主要靠海上运输，仅海防港每月吞吐量就达 21.5 万吨左右。水雷封锁后，港内停泊的数十艘外轮无法出港，外援物资无法进港，这对越南人民正在胜利开展的抗美救国战争极为不利。

在此之前，越南某些领导人已开始制造种种借口，破坏中越关系。但在被美国水雷封锁后，又不得不求助于我。

周总理对越南某些领导人破

坏中越关系的言行一清二楚，但仍以反帝大局为重，接见了越南大使。大使转达了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帮助扫雷的意向后，总理告诉大使：我海军扫雷工具比较落后，苏联海军这方面比较先进，你们能不能请苏联帮助扫雷？

越南大使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再次转达越南政府对中国的请求。总理送走大使后，便决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周总理介绍了上述情况后，问我：“来光祖同志，依你估计，美国在越南布的可能是什么雷？”

我迅速在脑子里分析了美国当时制造水雷的情况，回答说：“磁性水雷可能性比较大。”

总理听了点了点头，思索片刻后嘱咐我：“你们马上组织一个观察小组，先去越南现场了解情况，然后提出一个方案来。”

一回到司令部，我马上将总理的指示报告了肖司令和潘参谋长。他们要求，按总理指示办。

我立即打电话给海南舰队司令部下达任务，要求他们迅速组织一个观察小组，24 小时内必须赶到广西的白龙尾港。

南海舰队迅速组织了观察小组，由作战处长带领连夜出发。由于走得太急，途中车翻人伤。作战处副处长又带领观察小组直奔白龙尾港。

第二天周总理又为这事召见了我。这天大约也是快晚上 9 点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电话，说政治局要研究援越扫雷

问题，请海军司令部领导马上到人民大会堂，9点钟一定赶到。当时，我一听就急了，忙报告了潘参谋长。潘参谋长开始叫我跟作战部长去，我说不行，昨天总理还问您来着。

由于时间太紧，来不及仔细商量，潘参谋长就和我、作战部长匆匆赶到人民大会堂，入北门进了一个会议室。当时在座的除了总理，还有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我走在最后，会议室旁边空着的两个座位被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坐了，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总理看见了，就叫我，“来光祖同志，这里有位置。”

我一看，总理指着他与叶帅之间的座位，忙说：“不！不！”

“哎，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还客气啥？不然，总理该生气了”。记不清谁说了这么一句。

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了周总理和叶帅之间的位置上。

“好，现在开会。”我一坐下，总理就宣布：“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援助越南扫雷问题。”

然后，总理说：“来光祖同志，现在已经证实，美国在越南布的水雷，正是你昨晚估计的那种磁性水雷。”

我一听，马上向总理报告：“总理，按照您的指示，南海舰队派出的观察小组已在一小时前

抵达白龙尾港，并与越南方面取得联系，正待命赴越。”

“好！好！”总理很高兴，“海军这次执行任务，行动比较快，干得不错。”

总理接着看了我们带去的有关海图，并问从防城到海防有多少港口？有多少航道？

当议到如何组织扫雷部队，怎样实施扫雷问题时，潘参谋长和我作了介绍，大意是：对反水雷斗争，海军的经验不多，只是在建军初期扫过几枚触发锚雷。而且海军现有的扫雷舰艇，都不适用于扫磁性水雷。虽然几年前已在上海等造船厂研制一种适用扫磁性水雷的遥控扫雷艇，但进展缓慢。因此，我们建议加快研制这种遥控扫雷艇。

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并请当时在场的上海市领导人抓紧这项工作。

接下来，总理作了如下指示：一、摸雷。就是把美国布的水雷想办法摸几个，分析是什么性质的，以便进行破雷。二、破雷。根据敌人布的是什么雷，想办法扫除。三、避雷。要继续进行侦察，研究怎样避开。

总理还说，这次斗争需要海军的地方很多，海军要拿出积极性，拿点“种子”出来，进一步发挥作用。

总理指示后，叶帅接着说：“今天总理叫海军的同志来，是研究避雷、摸雷、破雷的措施。海军的战备工作要加强，要提到